

◀ (上接13版)

一点;到外国后,学问长进的必然更快了。

此时的冯友兰还称不上是教育家,但他基于自己的经验提出的意见却无疑十分中肯,不仅合乎人才成长的教育规律,而且也考虑到了中国的国情,同时更出自他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期待。他在文中虽然也谈到经济层面的考量,可其重点显然在于主张留学生到了适当年级/年纪再选派出国,可以“对于中国情形,更数一点,心里问题,更多一点”。可见,冯友兰对于留学是具有高度自觉的认识的。他不仅将之作为个人的人生志业选择,同时也将其视作变革中国的重要途径。而他本人当然也以其选择的专业研究的方式参与了变革事业。



1918年6月,冯友兰(二排左四)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时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哲学门教授马叙伦、梁漱溟等人合影

“我的哲学活动的开始”

1920年1月22日,冯友兰与同学张奚若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报到。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毫无困难。入学处一闻系北京大学,即时允许。”31日,他与同学杨振声正式在哥大办理了注册手续。冯友兰说:“离家将半年,到今始能入学,可叹!”所谓“离家将半年”,是从其1919年9月由开封至上海算起的。但令人好奇的是,既然入学过程“毫无困难”,冯友兰又因何“可叹”?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总结了自己在北大求学三年的收获:“这三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开始知道,在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第二阶段,我开始知道,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其中,“新的天地”指中国古典学术的堂奥,而“更新的天地”,则是指西方现代学术的门径。这两重“天地”的分界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置身于这一历史进程,冯友兰不但多受熏陶,而且也多有思考。在他看来,“这两个天地是有矛盾的,这是两种文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当时的一部分人,不承认这是古今、新旧的矛盾,而认为是东西、中外的矛盾。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是故,对于“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的比较研究便开始进入他的视野。不过他在北大并未获得对于这一问题的圆满解答。他认为,“当时百家争鸣,多是矛盾的体现,对于矛盾的广泛解释和评论,还是比较少的”。自此,冯友兰毕生的哲学与哲学史研究都追求在“解释和评论”的层面上做出贡献,而不仅是“体现”议题。日后,他将自己的学术理路与关怀概括为“释古”,其最初的问题意识或许就可以追溯至此。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议题的思考,正是其赴美留学的主要动力——

从1919年,我考上了公费留学,于同年冬到美国,次年初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当时我想,现在有了一个继续学哲学的机会,要着重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哲学活动的开始。

也就是说,在冯友兰看来,当时“中国的实际”即是“两种文化的矛盾”。无论怎样界定这一“矛盾”的具体内容——“古今”、“新旧”还是“东西”、“中外”,矛盾都是客观存在,并且为学界,甚至一般人都必须直面与正视的。冯友兰选择申请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为的便是从哲学的高度对于这一矛盾做出解释和评论。而这正是他把对于“中国的实际”的关注落实到哲学与哲学史研究中去的一种努力。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日记中写下“可叹”——他实在是迫不及待希望开启自己的博士生涯了,因为他

的关切实在兹事体大。

1919年的冯友兰,前有在开封参与五四运动的经历,后有在纽约追索学术志业的踪迹,即便总体而言,该年只是他生命历程中的过渡时期,但同时却也不啻为一个“关键时刻”,更何况他自己还将之赋予了重要的坐标意义——“这是我的哲学活动的开始”。

1919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年,冯友兰将自己的“哲学活动的开始”定位在该年,这便自然建构起了他的学思历程与大的历史进程之间的有机关联。

有研究者从冯友兰与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势位”不同入手,提出冯友兰虽然不像傅斯年因为在五四运动中头角峥嵘而很快为世所知,但“坏事也往往可以变成好事”,因为“少了一顶反传统英雄的桂冠,反而让冯友兰不必像傅斯年等那样,在反传统的道路上驰骋追逐一往而不知返”。更进一步来说,“冯友兰日后能既继承了五四,也批判了五四,因而也超越了五四,使自己从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立场,一变成为‘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新儒家立场,也使自己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变成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这和他‘不幸’而未能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亦即“如果从这一角度看,他的‘不幸’,又反而是他的幸运了”(参见翟志成的《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1895—1949)》)。“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与“保守的民族主义

者”的分辨富有洞见,可由于研究者过于鲜明的个人立场,所以为了突出冯友兰独到的认识价值,不免将作为参照的傅斯年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都做了过分抽象与单面的描述。而事实上,在冯友兰身上可能并不存在如此泾渭分明的“转向”。

冯友兰是不折不扣的“五四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洪流——特别是蔡元培的改革与胡适的影响——把他引向与带入了此后的历史进程,所以在分享“五四新文化”的主流价值与基本观念方面,他与同代的傅斯年等人并无根本不同,这点在他对于“中国的实际”问题的理解上即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现场的“缺席”者,倒是提供了“五四新文化”在现代中国展开时的另外一种“在场”经验。概而言之,冯友兰不仅从来未尝“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更从来没有作为“新文化”对立的一方。他是“新儒家”,但同样也是“新青年”。对此,我曾经写道:“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新青年’这一称谓相对稳定地与‘五四’一代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有独立历史品格的“代”的形成,不完全依赖生理的年龄组合以及生物的自然演进,更注重知识结构与表演舞台’。(陈平原语)而‘青年’与‘时代’正是在‘五四’一代的代际经验中最为自洽与自足地融为一体。相反对于‘新儒家’这一符号的争夺,则迄今尚未停息。以冯友兰的个案观之,‘新儒家’可以是一种思想方案,也可以是一

种文化立场,还可以是一种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激荡的情怀。但是,要在这一称谓的指涉之下触及真正的文化与时代命题,则必须与‘新青年’的身份合二为一。”冯友兰将自己的“哲学活动的开始”定位在1919年,恰是提示我们必须重新打量既有的讨论其学思历程与“五四新文化”的方式,从而生成一种更为整全与通透的历史感觉与理论意识。

* * *

1919年初,冯友兰作过一首题为《一九一九年夜过黄河铁桥》的旧诗。诗曰:“夜过黄河风怒号,烟波暗淡月轮高。挟沙走石来千里,横绝中流是此桥。”此诗仿佛即是冯友兰个人的精神写照。这一年的中国与世界,亦是“怒风高月”与“挟沙走石”,在某种确定的愿景中展开了充满不确定的未来。而冯友兰便是在历史浪潮中穿行之人。这一年,他既在历史事件的核心现场以外,又置身涟漪之中;既悄然向着个人的志业目标前行,也将自己学术生涯的选择同历史进程紧密地关联在了一起。所谓“横绝中流是此桥”,冯友兰的“桥”便是在1919这一年的经历、追求、观察与思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